

# 辞书研究

CISHU YANJIU

2  
1979

# 辞书研究

1979年第二辑

出好辞书，为四个现代化服务……………本刊评论员( 1 )

——祝贺《辞海》1979年版诞生

《辞海》是怎样修订的?……………罗竹风( 5 )

解放思想是加速《辞海》出版的推动力……………束纫秋 徐寿明( 16 )

尊重历史，实事求是……………郭加复( 24 )

综合性辞典浅谈……………舒 池( 33 )

辞书编纂中的平衡问题……………严庆龙( 35 )

从一枚金币看作者的辛勤劳动……………肖 岚( 38 )

编辞书和查资料……………陈光裕( 40 )

关于“中国”一词的含义……………朱 方( 42 )

要让客观事实讲话……………陈 炳( 45 )

这也是“水分”!……………王自强( 48 )

怎样介绍科学家……………秦振庭( 49 )

从“福”字说起……………卢润祥( 50 )

试论辞书的政治性……………巢 峰( 53 )

坚持辞书的科学性……………徐庆凯( 65 )

知识性——辞书的中心……………杨祖希( 71 )

谈辞书的稳定性……………冯英子( 81 )

辞典要有简明性……………池 哲( 86 )

选词十忌……………王芝芬( 91 )

综合性辞书的体例……………严 霜 王自强( 94 )

《辞海》  
编纂  
杂谈

语文词典有阶级性吗……………谢自立(100)

对几种释义类型的分析……………鲍克怡(113)

——讨论语文词典有没有阶级性

词典与政治纷争……………〈英〉R.W. 伯奇菲尔德(120)

关于词典编纂工作的自动化……………〈苏〉E.B. 维尔捷利等(129)

词典字头的性质及其释注……………刘叔新(136)

破读音的处理问题……………唐作藩(148)

我们研究的结果……………〈荷〉阿尔—卡西姆(159)

——词典编写和评价的标准

关于《广州话方言词典》……………饶秉才 欧阳觉亚 周无忌(163)

《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》的编写问题……………周长楫(172)

关于汉语成语词典的引源问题……………孙良明(188)

双语词典中的释义和翻译……………陈楚祥(193)

双语词典中的词语复现问题……………韦光华(202)

略谈《广雅疏证》的词义训释……………祝鸿熹(211)

中国辞书史话(下)……………方厚枢(219)

百科全书(下)(英国百科全书条目选译)……………周忠杰译(230)

关于编写《汉语白话文词典》的建议……………裘克安(257)

辞书人物

“好哇，大主笔！”……………黄建华(259)

——法国辞典家罗贝尔小传

简讯 · 编后记

# 出好辞书， 为四个现代化服务

——祝贺《辞海》（一九七九年版）诞生

本刊评论员

在全国亿万人民群众团结一致，同心同德搞四化的热潮中，《辞海》（1979年版）问世了，这是解放后我国大型辞书编纂出版工作的一个良好开端，对提高人们科学文化水平，为四个现代化服务，将起到一定的作用。我们对此表示热烈祝贺！

我国工具书和辞书的编纂出版有悠久的历史，是世界上出版辞书最早的国家之一。汉初学者缀辑西汉诸书增益而成的《尔雅》，东汉许慎系统分析字形，考究字原的《说文解字》，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；明代的《永乐大典》共有22,877卷，三亿七千余万字，曾被西方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，清代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内容也十分丰富。这些对保存、积累、发展祖国文化起了重大作用，反映了中华民族具有光辉灿烂的科学文化历史。但是自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，辞书编纂工作便日益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。虽然如此，解放前编纂出版的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、《辞通》等，供读者查阅参考还是超过一定作用的。

建国以来，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重要，同世界各国交往日益

频繁，而辞书的编纂出版却大大落后于客观形势，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。《辞海》修订廿多年，几经周折，特别是受到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干扰破坏，造成“难产”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由于党的关怀和重视，《辞海》才获得新生，正式出版。这对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，是一项基本建设，在出版史上是一个重要事件，在辞书编纂出版工作中是一个重大突破，特别是随着全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，对于四个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。

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，是“神州九亿争飞跃”的宏伟事业，需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，才有可能实现。现代科学技术正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，各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，新的理论学说，新的生产技术不断出现。我们的工人、农民、战士和干部只有具备相当的科学文化水平，掌握现代化的生产技术，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。我们的知识分子，既是科学文化的传播者，又是科学研究的尖兵，更需要进一步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，担负起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，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光荣任务。正如华国锋同志所指出的：“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，是摆在全体人民面前的一项极为巨大的任务，这是一项战略任务，这个任务不解决，新时期的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”。

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和提高科学文化水平，要求在整个社会提倡勤奋地学习和钻研政治、文化、科学技术。毫无疑问，在这当中各种工具书包括辞书将日益迫切地为人们所需要。《辞海》（1979年版）的出版就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。

人类知识浩如烟海。不论是谁，都不能事事直接经验，必得借助前人和别人的经验和知识。无论是基础学习或科学研究，涉及到每一个人的专业以外的知识是很多的。《辞海》的特点之一，就是适应这样的要求，可以适当满足普及与提高的共同需要。《辞海》内容涉及120多个学科，选收单字14,872个，词目91,706条，包括成语、典故、人物、著作、历史事件、古今地名、团体组织，以及各学科的名词术语等。可以向一般读者提供某一问题的基本概念

和必要的知识。俗话说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”当你在学习中、科研中遇到一个个“拦路虎”时，《辞海》可以发挥其“利器”的作用，帮助你排除困难，解惑释疑。它是案头的“良友”和朝夕皆可请教的“老师”。

现在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业已公开出版，受到了读者的欢迎；《汉语大词典》、《汉语大字典》、《辞源》以及各种专科辞典的编纂、修订工作，特别是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的编纂工作，都在积极进行中，并将于明年开始陆续出版。可以设想，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，必将迎来一个文化建设高潮；而在这个文化建设高潮中，我们将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为广大读者所欢迎的辞书。这一喜人的形势，正鼓舞和策励我们加快步伐前进。

要做好辞书编纂工作，就要有一支雄厚的编纂队伍。《辞海》经验证明，要编写一部辞书，绝不能搞“人人编书”的群众运动，也不要搞那种形式主义的工农兵参加的“三结合”，必须实事求是地依靠专家、学者，依靠知识分子。直接参加过编写《辞海》工作的专家、学者超过5000人，他们有丰富的专业知识，又在长期编纂实践中掌握和熟悉了辞书编写的基本知识。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，是不可能编出新《辞海》来的。现在，许多专科辞典、大百科全书的一些分册，又都是以他们为主体进行编纂的。事实证明，他们是辞书编纂工作中的重要力量。巩固、充实和发展这支力量，加强辞书作者队伍的建设，是保证辞书编纂的一个基本关键。

要做好辞书编纂工作，还要有一支得力的编辑队伍。《辞海》经验证明，一部辞书从计划编纂到定稿出版，除了作者的辛勤劳动外，始终离不开编辑的精心浇灌。辞书的编辑，既是辞书的组织工作者和技术规格设计师，又是作者在编写辞书条目时的得力助手和“作战”参谋。牡丹虽好，还要绿叶扶持。辞书的编纂，大多是集体创作。承上启下，左右联系，穿针引线，搭桥铺路，能够离开编辑吗？不能。统一认识，统一规格，加工整理，联成整体，能够离开编

辑吗？不能。事实证明，熟悉辞书业务，掌握辞书规律，热心辞书出版工作的编辑，也是辞书编纂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力量。巩固、充实和发展这支力量，加强辞书编辑队伍的建设，是保证辞书编纂的又一个关键。

要做好辞书编纂工作，还要加强资料建设。编纂辞书，离不开资料。知识是个无边无际的世界，任何人都无法懂得一切，记住一切；编辞书不是靠灵机一动地拍脑袋产生的，而是靠成年累月地积累资料、掌握资料编出来的。离开了资料，编辞书就寸步难行，即使勉强编出来了，也只能是废品或次品，同知识丰富和资料翔实的要求距离很远。在辞书编纂过程中不断加强资料建设，包括资料的搜集、整理、积累、运用等等，不能不是保证辞书编纂的关键之一。

以上这三个关键，是实践所已证明了的最基本的关键。

当前，随着全国工作着重点的战略转移，各条战线都围绕着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，人人想四化，人人钻四化，人人干四化。工具书和辞书的编纂出版工作也在急起直追，争取为四化服务。《辞海》是建国后第一部大型综合性辞书，在廿二年的修订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经验十分丰富，这些对其他辞书的编纂出版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我们在《辞书研究》的第二辑中，已部分予以刊载，以供大家研究和探索。

我们祝贺《辞海》(1979年版)诞生，热烈希望有更多的辞书相继问世，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中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！

# 《辞海》是怎样修订的？

漫谈《辞海》的性质和历程：

罗 竹 风

辞书和其他工具书的出版工作，是一个国家科学文化水平的标志之一。欧美各国和日本在这一方面，显然是先进的。中国地大、物博、人多，而且文化悠久，但辞书的编纂出版工作却是相当落后的，与国家地位和人民需要，极不相称。

《辞海》的修订出版，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“质疑问难”的综合性辞书，这对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，向“四化”进军，都是很有帮助的。

修订《辞海》的任务，是1957年秋毛泽东同志交给上海的，转眼已经二十二年了。回顾过去，展望未来，我们既有无限感触，也有说不尽的喜悦和慰藉。总之，经验教训是不少的。

## 一、走过一段弯曲的道路

由于缺乏经验，对任何一件新工作，在没有掌握它的规律以前，走点弯路总是难以避免的。修订《辞海》也是这样，从无知到有知，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，我们走了一段弯路，付出了一定的学费。

概括说来，《辞海》修订工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：第一个阶段是从1958年到1965年。这期间，出版过十六分册的《试行本》，在向全国征求意见以后，按照《辞海》固有体例，合编为两卷本的《未定稿》。前后经过大约七、八年时间，一般说工作还是相当顺利的。这是由于很快地纠正了把大跃进的一套办法搬到《辞海》修订工



作中来的错误，从而初步摸索到辞书编写的规律，明确了《辞海》的性质和任务，及时地提出了“政治性、科学性、通俗性”（即“前三性”）；在浦江饭店第二次集中修订时，又提出“正面性、知识性、稳定性”（即“后三性”），作为编写的指导方针。这样，参加各学科编写的同志，就有了遵循的准则和努力的方向。

同时，一开始就提出贯彻“百家争鸣”的方针。对生物学摩尔根和米丘林两个学派的处理，是当时大家所共知的事例。凡是两派共同承认的，就合为一条来写；不同的主张和意见，分列义项，各说各的。在学术问题上，允许争鸣，不强求一律。只有这样，才更有利于促进科学研究的开展。

辞书不同于一般图书，更不同于报刊。基本的原则应当是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作指导，准确而又简明地给读者以具体知识，释文恰如其分地如实反映出对象的实际，而且最好是用原始资料加以说明。要避免想当然和无根据的论断。介绍稳定性的知识，是辞书最根本的任务。这样也自然会得出依靠什么人编写或修订辞书的结论来。二十二年的实践证明，知识分子、学者、专家是主力。过去一直说火车的自动挂钩是詹天佑发明的，以讹传讹，几乎没有什么人怀疑了。果真如此么？一位老一辈的科学家茅以昇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。他认为火车首先是在欧洲发明并广泛利用的，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时，中国还是很落后的，他不可能发明自动挂钩。我们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，还到詹天佑的家乡访问过，看了他修京张铁路时的日记，没有发现与自动挂钩有关的任何材料。这样就改正了一个相传已久的重大错误，提高了〔詹天佑〕这一条目的科学性。

修订《辞海》是一项重要的科研项目，必须认真对待，全力以赴，决不能掉以轻心，潦草从事。写一篇文章，作者可以任意发挥，只要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，也就行了。但是辞书的条目，字数有限，而又要给读者基本的和必要的知识，并且尽量做到材料与观点的统一，言简意赅，不蔓不支，把释文限定在叙述具体内容范围以内，做到

具有严密的科学性。这对培养实事求是、认真严肃的优良学风，是大有帮助的。凡是参加《辞海》修订工作的同志们都有深切的体会。

这一阶段，成绩是主要的。但是也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，对社会学 and 心理学抓得过死，对某些条目采取躲闪回避态度，消极对待。最后以《未定稿》的名义出书，作内部发行处理，这应该说是为了怕犯错误而犯下的一个更加严重的错误！天下又哪有十全十美的事情，对《辞海》偏偏求全责备，延误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如果当时即以“定稿本”向全国公开发行，任凭广大读者去检验，岂不更好？

文化大革命期间，算是第二阶段。《辞海·未定稿》被诬为集古今中外封、资、修大成的大毒草，打入了十八层地狱，把一切罪名都加到它的头上，好象变成了人间罪恶的渊藪了。参加编写的人也无所容于天地之间，在劫难逃，不管在什么单位，几乎都被批斗。除原有的“罪行”之外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再加上这样一个砝码，等于罪上加罪，罪加一等了。

1971年，周恩来同志提出把修订《辞海》的任务列入国家出版规划，并且希望能够及早出版。但是在“四人帮”及其爪牙们的把持操纵之下，横一个评法批儒运动，竖一个批判《水浒传》运动，《辞海》修订工作当然也被牵进了政治旋涡，于是大杀大砍，弄得体无完肤，面目全非了。他们以贴政治标签代替科学分析，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人物按儒法两家的模式进行图解，大批判的语气充斥字里行间，《辞海》变成了十万大批判书，肆意破坏了辞书的规律性。更有甚者，“四人帮”及其爪牙，还妄图利用《辞海》为他们篡党夺权、树碑立传制造反革命舆论，美化吕后、武则天就是为叛徒江青“登极”鸣锣开道。

“四人帮”及其爪牙们的阴谋如果得逞，《辞海》必将是一部颠倒黑白，混淆是非，空话连篇，荒谬绝伦，棍子帽子满天飞，腾笑中外的大毒草。完全可以说，这场浩劫对整个文化教育造成了极大的灾害，《辞海》更是难以幸免的。

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，一举粉碎祸国殃民的“四人帮”，

全国人民得到第二次解放，莫不奔走相告，欢欣鼓舞。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一样，《辞海》最后定稿出版，也有了指望，于是进入它的第三个阶段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，为把全国工作重点转向生产建设方面来，号召九亿人民全力以赴地向“四化”进军。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学习和讨论，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，这样也必然会突破前进道路上的许多禁区。“解放思想，开动机器，实事求是，团结一致向前看”，正是大家共同的要求，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愿。去年十二月，上海市委决定恢复和充实“辞海编委会”，加强领导，统筹安排，对《辞海》进行最后一次修订，出版合订本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。这一光荣任务下达后，经过九个月的艰苦奋斗，《辞海》的编写、校对、发排等任务，提前完成了。我们没有辜负领导上的期望，也没有辜负广大读者的要求，这是上海和全国学术界的丰硕成果，也是一切参加修订工作的同志们辛勤劳动的结晶。它说明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，为了完成一部辞书的修订、编写任务，可以调动全国学术界的力量，大家团结一致，共同奋斗，二十余年如一日，终于看到了它象一个满期的婴儿呱呱落地一样。纵然因为参加编写工作而受到“四人帮”的打击、摧残，但从不计较个人恩怨，再接再厉，这种百折不挠、勇往直前的精神，是多么值得我们敬佩呀！

二十二年来，《辞海》修订工作走了一个弯曲的“之”字形。它也充分反映了祖国和人民走过来的崎岖道路。但是不管怎样，真理在手，即可所向披靡，成为战无不胜的雄伟力量。从长远的历史发展观点加以衡量，“四人帮”的祸害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瞬，螳臂挡车难道是可能的么？往者已矣，来者可谏，《辞海》的正式出版发行，是辞书出版事业的一个信号，预示着今后将有各种类型的辞书和工具书跟上来，为满足广大读者“求知欲”的需要，为推动我国向四个现代化进军，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辞书学，而不断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。

如果把二十二年修订《辞海》的经验汇集起来，那就应当表述为：

在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指导下，实事求是，为读者提供相对稳定性的知识；并以知识作为武器，改造社会，改造自然，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，跻身于先进文明国家之林。

## 二、从修订《辞海》看知识分子的作用

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，鸦片战争以后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，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必然处于极端落后状态。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，又经常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，习以为常，积重难返。要想改变这种愚昧落后、固步自封的情况，必须依靠知识分子起先锋、桥梁作用。毛泽东同志曾经不厌其烦地再三告诫说：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多了，而是少了。没有知识分子，革命也不会成功。因而要团结知识分子，关心他们，爱护他们，尊重他们。这些话都是针对中国实际提出来的。

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通过知识分子才被介绍到中国来的。没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，工人阶级便不可能从“自在的阶级”走出来，并上升为“自为的阶级”。他们的斗争也只能限于为提高工资和改善生活的低级阶段，绝不能具有“去掉的只不过是脖颈上的一条锁链，而赢得的是全世界”这样远大、宏伟的理想。

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明摆着的：就是团结、教育、改造。其目的又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。但是在贯彻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，长久以来，是受极左思潮干扰的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多年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更加肆无忌惮，排斥、仇视知识分子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除了极少数以外，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受到了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，统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。什么臭老九，什么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，什么洋奴特务，什么草包骗子……。总之，都变成了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，

理应受到奚落、辱骂以至于惩罚。于是强迫他们去扫地，倒痰盂，刷马桶，当时就有人意味深长地感叹过：这才真叫“斯文扫地”呢！

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专横的十几年，对知识分子采取粗暴的“专政”办法，这当然是一种极端反常的现象，不能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相提并论，加以混淆。

过去对知识分子的政策，也走过弯路，但基调却是“左”的，不妨用“见外”两个字加以概括。他们竟然变成了国家的“客人”，缺乏当家作主的感觉。无端地把知识分子排斥在外，必然难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，把力量真正用在刀口上。在有的领导看来，知识分子是改造的对象，而自己却以改造者自居。身分地位完全不同，又怎会产生共同的思想感情和语言呢？长期以来，同床异梦，又怎能扭成一股绳，把工作搞好呢？

知识分子属于脑力劳动者，是人民的一部分。特别经过二、三十年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的考验，证明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热爱祖国的，愿意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；同样也证明他们是拥护共产党的，并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。这样鲜明的政治态度，难道还有什么值得非议的么？要求人人都成为马列主义者，这不仅是不可可能的，而且也是不必要的。

所谓知识分子，就是他们掌握和积累了某一方面的知识，或者学有专长。对知识分子团结、教育、改造，首要的还在于团结，团结是教育、改造的前提；没有团结的愿望，就根本谈不到教育、改造的实效。况且教育、改造也不是单方面的，无论是谁都要教育、改造，因而它是双方的，需要取长补短，相互帮助，共同进步。团结、教育、改造是为了发挥知识分子更大的作用，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一切力量。学以致用和用其所长，大约便可加以概括。让电子计算机专家到商店里去打算盘，把一位航天学者分配去扫马路，这就是学非所用；学非所用，就是极大的浪费，愚人所不为，更何况是共产党呢？用其所长，就是工作对口，充分发挥他对某一学科的专长，落实下来，不要轻易改变。不然，乱点鸳鸯谱，学非所用，用

非所长，极大地浪费了人材，又怎能做到“各尽所能”呢？

在依靠什么人修订和编写《辞海》的问题上，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1958年受大跃进的影响，曾经大搞群众路线。想当年，头脑一发热，几乎什么规律都不屑一顾了。全民作诗，李白、杜甫早已不在话下。把现成的铁窗铁门拆毁，以至于砸锅炼钢；掘地三尺，把生土翻上来，说是可以增产粮食。推而广之，“人有多大的胆，地有多大的产”，大放卫星，亩产十万八万斤；“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”；吃饭不要钱，十年八年“进入共产主义”；全国城乡打麻雀……。单就《辞海》而言，大鼓干劲，大走群众路线，写出来的稿子却等于一堆废纸。

通过实践，对专家学者的作用有所认识，在浦江饭店三次集中时，明确了各学科主编的职责，条目释文也都由专家学者最后定稿。一直到《未定稿》付印之前，依靠什么人修订、编写《辞海》的问题，似乎已经解决了。但由于清规戒律很多，有的禁区甚至是万万碰不得的，因而等于带上脚镣跳舞，不能旋转自如。有时不可能从实际出发，戴帽子、贴标签、含糊其词、不敢画龙点睛的事情还不算少。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，李秀成、陈独秀、瞿秋白等，都成了难题。因为彭德怀的原因，连〔平江起义〕也取消了。不是根据一个人的生平作出全面的估价，而是“攻其一点，不及其余”。或者是什么人说过那么一句两句，语焉不详，就据以“定案”，岂非冤哉枉也！？

另外，以我划线的情况也很严重。联合国是一个客观存在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参加了。当时由于美、苏两霸纵横捭阖，操纵联合国作为争夺的工具，而所作决议又往往是不符合小国和弱国利益的。但从介绍知识的角度出发，联合国的主要组织机构，似乎应当多收几条。因为中国没有参加联合国，只收了〔联合国〕、〔联合国安全理事会〕和〔联合国大会〕等有限几条。

对历史上的领土问题，也是顾虑重重，唯恐犯所谓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。〔渤海国〕这一条目，就是明显的例证。凡是历史上的

问题,应当实事求是,理直气壮地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。如果躲躲闪闪,含含糊糊,前怕狼后怕虎,那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原则,不符合科学精神的。然而由于思想受到桎梏,谨小慎微,唯恐犯错误,就不能放手发挥专家学者的所长,尽量把应有的知识贡献给读者。

经过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大破坏之后,从去年12月起最后一次修订《辞海》,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,许多重大原则性问题进一步明确起来,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深入人心,大家解放思想,不断突破禁区,因而实事求是的精神得以贯彻,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进一步调动和发挥起来,对全面提高《辞海》的质量起了决定性作用。

知识分子就是要用知识为人民服务的,修订《辞海》,正是“得其所哉”。可以断言,没有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的努力,《辞海》是不可能出版的。人造卫星上天,需要科学家的创造发明,否则不管多少人,即使是全中国的九亿人口,也不可能把它扔上天去。

1979年版《辞海》合订本在短短九个月里能够出版,固然由于过去已经奠定了一个相当坚实的基础;但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之所以如期完成,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,不辞辛劳,全力以赴,也是其中主要的因素之一。从修订、编写《辞海》来看知识分子的作用,无论怎样高的估价也是不为过的。

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说:“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翁,是社会主义的工人,社会主义的农民,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,以及其他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。在他们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矛盾,但是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,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利益。这些是我们已经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,这些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。”邓小平同志也在五届政协二次会议上的《开幕词》里指出:“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,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,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,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。”这些科学分析,更加明确地规定了知识分子的性质和作用,大大有

利于调动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，更加发挥革命积极性，为建设“四化”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一切力量。

知识分子正是用他们的知识和专长为人民服务的，从修订、编写《辞海》的工作中，充分地证明了他们是依靠的力量，也必须一心一意地依靠他们。只有这样，1979年版新《辞海》才能如期出版，向今年的国庆三十周年献礼。

### 三、1979年版《辞海》的新面貌

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，是至理名言。钝刀子割肉，只能少慢差费。《辞海》是一种工具书，供读者“质疑问难”，满足求知要求的。新版《辞海》尽可能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，有助于探索知识，解决疑难。如果把它看成是“良师益友”，也未尝不可。

新版《辞海》的面貌究竟怎样，需要通过“比较”才能看得清楚。1936年出版的老《辞海》，和出版时间差不多的《辞源》和《辞通》是不相同的，各有偏重，各具特色，因而无从比较。新版《辞海》只能同老《辞海》和《辞海·未定稿》相比，从中看它的面貌究竟是怎样的？有哪些优点，还有哪些缺点？

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把修订《辞海》任务交给上海呢？我认为，《辞海》有它自己的特点，不是其他辞书（如《辞源》、《辞通》等）比得上的。就体例而言，它是兼有单字、一般语词和百科条目的综合性辞书，很象小百科全书。单字归部首查检，以字带词，而词又是按字数和笔画多少排列的。就其性质而言，既然是综合性辞书，所收条目的知识面非常广泛，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读者都可利用。人的知识是有限的，不能什么都懂；不懂的要想弄懂，简便的办法就是求助于辞书或工具书。正由于人的知识面不可能太广，一方面的里手，可能就是其他方面的外行。为了取长补短，从无知变有知，也得经常查辞书或工具书。而《辞海》兼有单字、语词和百科的优点，使用的人必然更多。有个生字、难字不识么？查《辞海》；有



个语词不懂么？查《辞海》；有百科知识陌生么？也查查《辞海》。一般说，它是会满足读者要求的。在中国当前的具体情况下，《辞海》的用处是比较广泛的。

但是从1958年开始修订《辞海》，一直到1979年新版《辞海》问世，几乎等于重新编写。1936年版老《辞海》的影子仍然存在，但内容已经改观了。除单字和语词部分尚有较多保留而外，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的条目和释文，改变极大，几乎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了。几十年来中国和世界都有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，科学文化也有极大的发展，老《辞海》早已不能适应今天读者的需要了，必须改革，必须更新，必须增补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当然，已经过时的、落后的甚至于内容反动的，也应当淘汰。在今天，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，尽量做到材料与观点的统一，这是我们同老《辞海》编写释文在政治原则方面的根本区别。

若与《辞海·未定稿》相比，条目有所增加，释义更加确切，新学科补充了，特别是因受极左思潮影响和干扰而不敢实事求是的问题，得到了纠正，澄清了是非，还原了事物的本来面目。对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散布的毒素，本着“去毒务尽”的精神，仔细地进行清查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对戴帽穿靴，一切空泛不实的大批判语气，也尽量地删除了。力争不出政治原则性错误和常识性笑话，一般可说做到了。对人物评价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，对某些有争议的人物，不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，而是全面考查，慎重从事。原来《未定稿》的许多禁区，只要我们认识到的，也都突破了。破除迷信，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这不能不归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方针，不能不归功于中央和市委的关怀和指导，不能不归功于全体编写同志和一切工作同志的协同努力。

总之，1979年新版《辞海》的面貌比过去新得多了，这主要的表现在：第一、条目增多、更新了。第二、释文更加确切稳定了。第三、整个内容充实了。第四、文风比较简洁明确了。第五、知识性得以全面贯彻了。在质量上比《未定稿》有较大的提高，更不要说